

罗伟章《谁在敲门》:慢镜头下的文明巨变

□ 李 静

罗伟章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给人的第一印象莫过于其厚重的体量。63万字，近700页，密密麻麻的文字你追我赶，共同走向这个浮躁时代的反面。正如罗伟章在新书推荐词中所说：“时间太快，太匆忙。我要让它慢下来，还原我们本来应该拥有的舒缓和宽阔。在热闹喧嚣当中，我们主动地、被动地丢弃了太多的东西。……那些东西用触目惊心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发现、捡拾、擦亮，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重新归于完整。”那么这本致力于恢复舒缓与宽阔的“慢小说”，到底发现、捡拾和擦亮了哪些东西呢？

“真正惊人的，都很普通和日常”（591页），小说接近尾声时抛出的这句话道出了基调与关切所在。全书共分七章，书写的都是最日常不过却又惊心动魄的内容：许家老父亲生日（一、二章），父亲生病住院（第三章），父亲葬礼（第四、五章），葬礼后亲友远离故土的人生走向（六、七章）。生老病死，聚散凋零，故事的展开行云流水，仿若暗合自然节律，几无斧凿痕迹。这印证了作者后记中的自述，他的写作不靠提纲，而是下一句踩着上一句的尾巴，自然流淌而成。其实小说的语言是非常精细的，多用短句，虽有方言的生动却毫不俗气，时有原创性的表达却又不显造作，这些无疑都离不开精雕细磨的功夫。而这种精致感与自然感并行不悖的奥妙，源自作者对实际生活的精准观察，也来自他对自身经验的高度重视。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罗伟章为何选择以第一人称“我”，亦即许家三子的视角展开叙述。因为第一人称方便他更直接地传递个人经验，更彻底地掏出内心的纠结。回顾他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对第一人称的偏好始终未变。这与他的写作高度依赖生活经验是很有关系的，在2019年的一篇访谈中，他坦言“我本身就构成现实”。比如号称本书前传的《饥饿百年》便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而《磨尖掐尖》等反映教育问题的作品则与他做中学教师的经历相关。当然，这种相关性不是透明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需要不断磨炼写作技巧来实现。具体到这本小说来说，写下第一行字的契机来自作者下派川西芦山期间，而写下去的动力，源自一首少数民族民歌搅动的情愫——“我心里或许就响起过那种寂寥的欢歌”，“最深的寂寥，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我的”（670页）。“我心中的寂寥的欢歌”，需要第一人称来承担，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局内人”的视角表达与故乡、与传统、与时代的复杂关联。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差序结构”，亦即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水波纹结构，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用在此处，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由第一人称作“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一群人的故事。

同样延续了罗伟章创作的一贯特点，小说中的“我”仍是出生于乡村的知识分子。“我”是在省城画报社工作的编辑兼诗人。因此“我”的返乡，串联起省、市、县、镇、村等多个层级，牵扯出城乡互动时的碰撞。与鲁迅百年前所作的《故乡》不同，小说中的“我”非但做不了启蒙者，反倒是无力回馈故土的无能者。因为知识，尤其是他的诗句，并不能带给故乡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小说里直白地写道：“自己没能力给故乡一丁点儿实实在在的在的好处，便颓然知晓，我是连乡愁的资格也没有的。”（508页）小说中二哥的书，甚至被二嫂拿去烧菜，给二哥烙下了一辈子的疮疤。知识的无力感、乡愁的合法性、“爱乡”与“怯乡”的纠结，这些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离土离乡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结构。如果说高晓声笔下的“上城”被演绎为一出喜剧，路遥笔下的进城故事被视为励志的正剧，那么罗伟章笔下的返乡叙事，则更接近于一曲目睹故乡渐渐消逝的挽歌。因此小说中展开的讲述，就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反而带有浓浓的无力感甚至怯懦感，以及时时跃上纸面的自省意识。

与“我”的无用相对照，小说中陆续登场的50余位人物中，最具血肉与华彩的并不是他们许家人，而是大姐夫李光文。光文是李家岩的村支书，也是众人信服的人。他深谙打通关系的学问，不仅与上级领导亲近非常，也跟三教九流来往密切。小说描绘了大姐夫的众多高光时刻，尤其是面对天然气公司高经理的“演讲”（105—106页）以及村里偷情猝死事件的“断案”过程（211—214页），都极为精彩，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大姐夫驾驭人性、熨帖人心的高超手段。借着对大姐夫的描写，基层乡村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运转逻辑也昭

然若揭。而大姐夫的时代也终将过去。终章开篇，县里为推行全域旅游，准备开展“红灯笼计划”。“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生八德倘若俱在，就在家门上挂盏红灯笼，而这也是吸引游客上门消费的招牌，只有百分之五的家庭可以“获此殊荣”。大姐夫为此十分为难，应归人事难以简单划定为道德，或是不道德。他之前处理村里的疑难事件，多是凭借自己的个人威信，从中协调斡旋，疏通情理，最终大家各退一步，达成和解。但此时伦理的逻辑要被置换为数字的逻辑、治理的逻辑。正如郑县长在传达“红灯笼计划”时所说：“如果要给政治归类，应归入数学，……数学作为最‘忠诚’的科学，无意中描述了政治的全部奥秘。”（569页）而与“红灯笼计划”接踵而来的是“选贫困户”。贫困户能收获补贴，红灯笼家庭能收获游客，二者并行，矛盾丛生。行政命令、数据统计，无端搅动了暂时平衡的人际关系，激发了逐利与计算的一面。最终，大姐夫为人构陷，锒铛入狱，这象征着乡绅式治理方式的结束，传统乡村自在运行的逻辑终将会被更加“行政化”“离地化”甚至“数字化”的方式所穿透、管轄。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对大姐和兄弟的着墨也比较多，很典型地塑造了大家庭中“长女”与“末子”的性格特征。没有担当的大哥、冷漠的二哥，他们的形象也相对丰满。这样的“家庭配置”，极具“中国特色”，应当会引起许多读者的代入和共鸣。比起“我”这一代，作者对第三代、第四代的描绘就显得单薄一些，尤其是对精神与情感的层面展现较少，这对于经验型的写作者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小说中的这些孩子们大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是早早进城务工，早早结婚生子。长孙四喜非但没有成为新一代的领军，如同以往世代的“长子”那样，反倒因为传销把众多亲戚拖下水，满嘴谎话连篇，仿佛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疫。这如同一个大家族崩解的信号，类似“长兄如父”的传统训诫近乎讽刺，子孙一代四处流散，故乡沦为没有灵魂的壳。

除去人物，小说的叙事节奏也很值得玩味，由极慢而极快，令读者也卷入巨变的洪流中。前五章的节奏非常缓慢，在主线之外，拥有众多人物的辅助线，信息浓度很高，逼得读者睁开眼睛去留意那些极易流失的细节，仅仅是几下敲门声，都别有洞天——“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当这个声音响起时，已去胸腔里荡过一下，夹带着气恼、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传到指骨，传到门，然后才传进屋子，大姐就知道，是兄弟来了。”（1页）这是全书的开篇，敲门的动作、声浪都被分解与延宕，足见作者的细描功力。小说中甚至直接出现了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可知作者对人类学式的“深描”并不陌生。而他对于生活细节精致、准确的描摹，也构成了一直以来的创作优势。不过，开篇这句话之所以令人难忘，倒不完全依赖写作技法的加持，而主要是源于对生活的冷静静观，说出了大家隐而未发的共识。大姐一家生活在回龙镇，这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人们仿佛都有穿墙破壁的透视能力，门外的声音都拥有专属的面貌与人格。寥寥数笔，大姐与兄弟的关系、兄弟在家庭中的地位，一下子鲜活起来。

小说中慢镜头般的描写俯拾皆是，甚至包括物件、动物、风景在内，堪称一种写作上的“齐物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野心，如此精致准确、叠床架屋的描写，不只是为了写父亲的故事、家族的故事、地域的故事，更是为了留存一种农业文明的样态。在语言表达上，经常出现“经验描写+哲学升华”的结构。在极其细腻的描绘之后，作者试图对农业文明以及其中孕育的人生百态，作出穷根究底的总结。不过，值得继续探究的是，如此缓慢的叙述，是否有点过于平均用力，进而导致重点的淹没呢？对于细节的珍惜，是否存在一个上限，进而能保证精细化与力量感之间的平衡呢？但如果将小说所要面对的文化语境也纳入观察之中，那么这种缓慢的叙事，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抵抗”？面对狂轰滥炸的快餐式文化消费，慢的意义是值得被高度肯定的。

老父亲过生日，本就是一两天的事，却足足写满两章。“父亲是离世界远了，他生日的全部意义，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儿孙团聚。能聚的人越来越少，表面的理由万万万千，最深层的，是父亲正在远离。”（111页）所以我们看到，因着父亲到大姐家过生日，门里门外，许家四代悉数登

场，各自的生命故事也摇摇曳曳地展开，彼此间的关系也被一一交代。那种亲人之间才懂的动作、语调、敏感词，被恰如其分地拿捏。亲人间远不止温情脉脉的一面，而且更了解彼此的不堪和隐忧，更容易被索取与依赖，因而亲人的聚会也不啻于“高危地带”了。席间往往暗流涌动，亲与疏，责任与义务，推杯换盏间演绎的是一出出“人生如戏”。出生于1967年的罗伟章，所代表的正是姐妹众多的一代人，对兄弟姐妹间的复杂关系，应当有深入骨髓的了解。而这份经验也被投射进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中。

生日之后便迎来死亡，生死不过门里门外的一线之隔。小说中最抓心挠肺的设置在于，对于父亲的脑出血，大夫闪烁其词，不能给出明确的结果。这就在子女间产生了分歧，也照见了各人的心思，大哥二哥主张把父亲尽早接回家，而“我”和兄弟则想继续为父亲治疗，穷尽最后一点希望。“我”的心态也很微妙，虽然早已无法与父亲单独相处，充满了疏离感，但最后花钱尽孝心的机会，还是不愿轻易放弃。可在众人的压力下，“我”选择了妥协，同意了把父亲提前送回家中，也就相当于掐断了生的希望。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篇现实主义基调下，护士程芳兵是一个幻梦般的另类存在。她漂亮、尽责，甚至与“我”达成了某种默契，令我十分依赖。但“我”离开医院时想与她告别，结果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存在。也许这可以理解为“我”在压力之下应激想象出的人物，从中获取有限的安慰。尽职尽责的程护士只要还在忙碌，父亲就还有一线生机。而程护士这个幻梦的破灭，也象征着父亲与医院、与生命的告别。

关于葬礼，同样写满了两章篇幅，展示了敬鬼神、重生死的“乡村知识系统”。阴阳刘鬼文根据八卦卦和命理推出破土下葬的黄道吉日，算起来父亲要在家中待九天。而这九天中有许多事项需要完成：建灵塔、搭灵棚、抬冰棺、绕棺、做法事、哭唱祭文、孝子哭丧、拜塔、发丧下葬等等。这些事项（比如大姐哭丧的全过程）都被详细刻画，见证了死者最后的热闹。热闹到极点，便是分离的开始：“多少家庭的结，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地口着，往往在父母的丧事期间，就爆发出来。”（293页）而小说中对于如何分礼金描写（233页），露骨而接地气，让人愈发看清了大家族“分家”的脉络。葬礼之后的六、七章突然加速，一泻千里，交代了众多人物的走向。子孙一代四散各地，“我”这一代也因为拆迁，被动搬离故乡。全书的精华更多地集中于缓慢的前五章，节奏加快的后两章更多地充满了宿命感，更多地抒发了在历史进步的必然性面前的情绪体验，因而较之前五章显得单薄一些。

不难看出，罗伟章是自觉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大历史背景中展开写作的。书名“谁在敲门”，可以被理解为外部世界的闯入，而门内之人必须承受突然降临的命运。这意味着变化，宣告着下一个阶段的到来。罗伟章把如此宏大的命题聚焦再聚焦，落到父辈生命的退场，细细推演故乡的当代命运，由此来理解这场不可逆的文明巨变。他的写作充满了地域色彩，甚至在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河之舞》便直接书写了古代巴人的传奇故事。《谁在敲门》中不乏对于大巴山脉、清溪河、古代巴人习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描绘，即便某些段落行文文中还不是那么圆融，也无疑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历史厚度与文明视野。他在后记中坦言，《“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671页）“每个时代下的人们，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672页）可见，他是从文明演进的长时段眼光里来审视与记录故乡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无法用类似“四川作家”“大巴山作家”或是“底层写作”这样的标签来框定罗伟章的写作。他的写作固然扎根于最熟悉的故乡，具有不容忽视的地域色彩。但其内里的创作冲动，是靠对时代命运的关注来驱动的。正是在时代滚滚向前的必然性面前，小说中孱弱的、被忽视的“文化”，那些不被珍视的“诗句”，反倒借由小说的行进，柔弱地申张着自身的意义。这里的意义并非妄图抵挡必然性的铁轮，而是将文学作为同路人，分担自己的命运。那些准确细腻而又缓慢的语言文字，就是意义本身。把时间变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文明巨变中的个人才显得那样鲜活饱满，那样有尊严与有价值。令人欣慰的是，《谁在敲门》为我们赢得了这样的机会。

2023年“五一”，我带着一颗放飞的心再次去了腾冲，在一半烟雨一半霞光的日子，有幸成为《立秋》的第一读者，带着审读的眼光，在《立秋》即将面世前留下了点滴痕迹。而这次的旅行藉着再度与“凌云青”的交集，有了时光交错，历史闪回，乡村与城市、人情世故诸多元素的杂揉，眼前每一次新的遇见都与旧的重重叠叠，直到完成20余万字文字之旅后的一口吁气，终于回到现实之中。

两年里，其实“凌云青”从来就没有走远。他既在作者《立秋》的季候里移步换景地快速成长，也一直在《惊蛰》的回顾与分享中深深刻印进读者的脑海里。从《惊蛰》里最后乘上那辆象征希望的绿皮火车，走出“观龙村”的少年凌云青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遇到了哪些人和事？《立秋》将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作者杜阳林依然用他的笔触娓娓道来，讲述大学毕业后的凌云青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继而下海创业，历经各种风险，在依然摆脱不掉的城乡差别中，与身边各种大小人物的交集辗转，一边挣扎一边奋进，最终成为一名民营企业家的人生故事。他将宏大的叙事落笔在个人命运中，读来既荡气回肠又深深叹惋。这是一部深度融入奔涌的改革大潮的时代之书，这是一部贴近我们熟悉的西部城市以成都为背景的生活画卷，这是个体命运在社会巨变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的探索与剖析，这是投身变革之年各种思潮碰撞触及灵魂深处的叩问与思考。作者将“凌云青”以及围绕在他身边各种形形色色登场的新旧人物，在看似平静的叙述里，极具张力地将其置身于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徐徐展开，于无声处见惊雷。

如果说作品《惊蛰》是作者书写原始乡村生活、揭开人性面纱的第一张遮羞布，那么《立秋》则是作者从乡村到城市、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一部精神文明奔徙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缩影。《立秋》中大量的人物都来自农村，从凌云青及其兄长凌云鸿、田小花到韩细君、吕冬冬、史国柱、朱先贵等等，“土地已经满足不了家乡人的生存愿望，他们络绎不绝地外出寻找生计，二十年未曾断绝……”当他们从出逃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即将经历的不仅是离开原乡的无奈，更是在蠢蠢欲动的欲望大潮汹涌抵达时，还没做好足够准备的仓皇与无措，当他们与曾黎、宋桥、冯金洲等先一步成为城里的人相遇后，发生的习惯、观念、生活哲学的各种摩擦与冲撞便不足为怪。

当观龙村的老乡们从“泥腿子庄稼人”一夜间变成了城里人，身体进了城，但思想和观念还在城门外。摸惯了锄头把的农民，身份转变成了打工仔，从服务员、销售员到商人，老板，甚至时代晴雨表的新闻人、媒体人，面对原本也并不完善的城市法规、职场规则、商业准则、市场竞争等一系列新的边界与约束、机会与挑战扑面而来时，物质生活可以快步提升，要完成精神的迁徙却非能一蹴而就，这正是作者想要在作品中探寻的内核。

所谓农村相对城市而言，具有特定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经济条件，所谓农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长时期以来，曾经相对物质贫乏观念落后的农村在农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特殊印迹，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尤其是当下新一代国家领导人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差别、振兴乡村经济的重大国家战略。作者杜阳林在《立秋》的主旨架构里，正是带着一个作家对家命运命的深度思考和使命感，围绕这样的命题拉开了一幅从农村到城市的精神跨越。

好在，作品的灵魂人物凌云青作为小说的绝对大男主，始终是作品的主旋律和牵引线，他带着他们从步履蹒跚到小步慢跑，再到紧跟时代步伐一路快进，直到他的餐饮学校历经各种磋磨终于建成。而学校是什么？不仅是帮助餐饮人培养生存技能的地方，“还要让他们了解城市的‘规则’”，帮助“那些双脚踩在城市地界的人，晓得公交车怎么乘坐，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嚣……当他们迈过城市的这道门，熟悉城市，融入城市，他们才能既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城市管理的参与者。”餐饮学校的建成，成为作品中思想提升、观念更新、接轨新时代，放眼未来的精神高地。小说写到处此，凌云青轻轻地松了口气，读者也松了口气，作者或许也小小地松了口气，算是阶段性地完成了一段精神文明的迁徙史。

改革开放，经济下海，思潮奔涌，在一次次的精神挣扎中，凌云青们也在打拼与奋斗，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呈现了一群打工人的心灵成长史。当已经走在时代前列的凌云青面对依然原地踏步却以乡情为由求上门的岳红花，面对凌云鸿与嫂子柳翠翠以亲情为由的道德绑架，面对渐行渐远曾经懵懵懂懂疑似初恋的韩细君，面对不断找上门寻求各种帮助的观龙村的老乡们，凌云青“能帮则帮”甚至不顾一切的付出，通过他的搭档宋桥一语道破：“所谓理想，所谓付出，也许就是‘无底’的另一重解释。他对理想感到畏惧时，他的身边却有人不知不觉地，成为理想的信徒。”“不知不觉”正是心灵成长观照现实的一面镜子，凌云青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些原乡人的责任担当，也在“不知不觉”中从最初开餐馆到成立公司到创办学校，完成了他理想与信念的升华，也引领着身边人在“不知不觉”中一边成长一边分化，一边融入一边裂变，直至突出重围。

立体呈现的时代命运交响曲 从《惊蛰》到《立秋》

□ 盛 红

小说中所有的分岔和支线自始至终都扎根在“奋进与突围”这条主动脉上，无论是对逃离原乡的纠结与期待，对新旧习俗相撞的痛苦与不适，对瞬息万变的城镇化进程的困惑与彷徨，还是面对亲情与友情、利益与得失的多元人性的刻画，无一不与这个变革的时代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互相叠加，相互支撑，继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让每一个人都在这张网里照出自己的影子，并在阅读体验中形成强烈的共鸣。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我喜欢的作家阿耐以及她同样书写改革开放断代史的《大江大河》，作者杜阳林和她一样都触及到了生存底线与精神归宿的哲学思考。余秋语说：“大问者便是大诗人。”他们将巨大的矛盾冲突撕裂开来其实就是另一种方式的交融。小说中所有人物的故事都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层层递进，步步解題，让每个行走在山河间的实际步履，将一切的伟业都变成了现实中的寻常风景，让涤荡的史诗般的哲学之思变成一个个的生活情节和细节，柴米油盐酱醋茶，合成一部凌云青式的人生命运交响曲。

小说《立秋》的主战场不再是观龙村，作者将其视角放在了成都这座独具魅力活色生香的城市，将其作为凌云青等系列人物活动的主阵地，矛盾冲突的聚焦场，实在是有一种出奇不意的效果。成都是西部开发的中心城市，改革开放的一片蒸蒸日上热土，却同时又始终保持着温润的向度和自我生长的节奏，作者更是将凌云青的创业版图放在成都烟火气浓郁的餐饮业，再次与这座充满活力又既极具生活气息的城市气质一脉相承，正是成都博大的包容性、厚重的文化背景和积极乐观的人文气质才给了凌云青们就业创业的机会和重构家园的极大可能，也使得原本恢宏的时代叙述变得不疾不徐，亦步亦趋。作者在此表现的拿捏功夫和分寸感也在人物和故事看似风平浪静却在水下一直扑腾的“鸭子效应”中得以充分彰显。

而作品中的人物线又并非仅仅局限于成都，还有陈涛与韩细君延伸至广州的轨迹，凌云鸿与柳翠翠被表叔杨伟带到温州打工的故事延伸，这些都跟改革开放后走在前列、有着鲜明标签的城市与地域有关，加之作品中大量涉及到的辞职、下海、求职、承包、打假、兼并、下岗、资本游戏、股东大会、股权改制、品牌、拆迁、旧城改造、成立商会、民企收购国企等极具时代特征的现实生活场景紧密相连，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时代标识性，增强了作品深厚的内容积淀，扩展了作品的视野和纬度，都与作者杜阳林曾经也是一名资深媒体人有关，没有做过多年记者的经历、观察和积累，难以驾驭经济领域题材以及对一个行业作出研判与深度解析的能力。

生存是什么？归根到底便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彼此妥协。英雄史诗也会变成文字存之于世，顾炎武说：“常将《汉书》挂牛角。”足以包容千般评述，万般赞美的堂堂汉代，也就那么晃荡在牛角上了。而《立秋》将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风云变幻的一段变革史通过凌云青们也牢牢地在一部文学作品里立足了。正如自然界里，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自立秋起，阳气渐收，万物内敛，同时也是不谷成熟，收获的季节，长篇小说《立秋》首发于殿堂级文学刊物《收获》头条，正是对作者虔诚的文学态度和勤勉的文学创作，收获的又一成果最好的注脚。《立秋》结尾已在宋桥失踪，凌云青帮助宋园收拾烂摊子等处理下伏笔，期待作者第三部命运交响曲，不知会在哪个节气里再度与凌云青重逢？

本版责编：崔 耕